

# 西行风土记

—— 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

方李莉 著



学苑出版社

J528  
33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

# 西行风土记

——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

方李莉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 / 方李莉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77-3553-6

I . ①西… II . ①方… III . ①民间工艺—陕西省 IV . ①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481 号

出版人：孟白

责任编辑：刘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1092 1/16

印 张：8.75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 总 序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我们对有关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研究的认识是：

一、我国西部的开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来自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但在一般人的眼里，西部开发仅仅是经济的开发，经济的增长率就是最高的追求目标，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人们可能会忽视生态的问题，尤其是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的失衡，不仅使文化多样性减少，文化传统消失，人文资源被破坏，还会带来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宗教的纷争等严重问题，最终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自治区，这里是是我国文化最多样化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说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课题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二、西部地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远在约一百万年前，那里就活动着元谋人、蓝田人，在二十多万年前还活动过原始的大荔人，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也都在那里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那里还是黄帝、炎帝的故土，上古时期的中国神话，一直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曾是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经济繁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西周到唐代，曾有十一朝皇帝在这里建都，这里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最早接受西来文化的地方。早在汉代，这一带就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随后在这条路上传来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文化，这些交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流变。

同时，这一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世代相传，积累保存了各种文字的大量文献资料，各种民族的口传史记，各种形态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歌舞音乐、戏曲、绘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人类心理、行为、语言和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变迁过程，对于研究宗教和艺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原生态文化，都极有价值。

三、西部这些珍贵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需要我们去保护的珍贵财富，同时还是中华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何确证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在文化上自我肯定，甘愿接受外在文化的文化殖民，就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焦虑和心理危机，同时导致传统文化的根基遭到动摇。中国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其根源正于此。也正因此，为了抵御正在形成的单边主义，各国的文化主体性正在觉醒，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在成为一种浪潮，不仅是来自民间，最重要的是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参与。这和以往的文物保护不一样，文物保护不代表文化的完整性保护，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文化的完整性保护。所谓的文化不仅包括了物质的部分，还包括了一个民族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宇宙观，以及道德准则等非物质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就不再只是放在博物馆展览的死的物，而是一种活态的、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建构我们未来政治、文化及经济的资源。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的研究，不仅包括了以上的政治问题，还包括了经济的问题和文化安全的问题。

如果说在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争夺的主要自然资源的话，在下一轮的后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要争夺的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将包括人文资源，今后人文资源是否丰富也将是一个国家国力是否强盛的标志。中国不仅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基因多样，其各个不同地方的传统知识也异常的丰富。这种知识不仅包括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宇宙观，也包括了各种手工技艺、动植物知识、气象知识、中草药知识等，这些是构成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些知识蕴藏在各地的传统民间社会中，是农业文明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这些人文资源都是可

以重新认识的无价之宝。它们是否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到合理的利用和发展，是我们在课题中必须研究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现在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文化以及各种民间文化呈一种复兴状态，而这种复兴，就是传统文化的复活，但这种复活并不是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在精神层面的。它是作为一种昔日的精神家园给予人们的寄托，让人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过去，或领略到不同地域的人文风光，甚至成为一种可以欣赏的活的艺术。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去满足另一种需要”。从功能上来讲，它不能再从制度上物质上去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但它却能从另一个层面，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去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能得到发展的根基，也是许多地方文化得以复兴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人类学家所认为的，传统与变迁是对立的、习俗与理性也是对立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正如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认为的，“晚期资本主义”最令人惊叹之处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不相容。许多地方正在出现本土化的现代性。但是这种本土化的现代性，如何实现与如何实践，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思考。

针对这些内容，课题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西北地区人文资源的全面梳理，从而我们大概知道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哪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其大概的分布及现存状况。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摸清家底，其既是一种文化的研究记录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保存方式。为此我们建立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第二个部分是对西部不同文化类型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人文资源这个词在我们的理论文章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但当我们将其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同时了解到具体承载着这些文化的群体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研究顿时会具体起来，我们会遇到许多在抽象的理论中未曾提出和未曾认识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做面的梳理的同时，还做了系列的个案研究工作，企图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找到我们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所在。当笔者带着问题去请教费孝通先生时，他指出：“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这是人类学里面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要多解剖几个，而且要用它们来相互比较。只要我们能科学地解剖这些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只有到实地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你们的研究要摆脱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要走出书斋，在实际考察中认识西部、了解西部。”他还说：“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

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

费孝通先生给我们课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的课题组成员虽然来自不同的人文学科领域，却能对一个共同的地域文化，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还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到实地去，到田野中去，观察最鲜活的社会事实，捕捉最新的文化重构方式，感受最新的时代发展脉搏。

通过7年多的研究，课题完成了73篇考察报告，并按内容编辑成5本考察集（《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西北少数民族仪式考察——傩舞·仪式·萨满·崇拜·变迁》、《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呼图克沁”——蒙古村落仪式表演》），完成了4本考察笔记（《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梭戛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陕西药王崇祀风俗考察记》、《西南山地文化考察记》），3本论著（《人文资源法律保护论——以西部人文资源保护为起点的研究》、《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总报告书《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共12本书，400余万字。

7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在西部的追踪考察，使我们亲身参与并感受到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缓慢的文化变迁，而是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力交锋中的重组或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其“资源”意义远远大于或超越其“遗产”意义。因此，从“遗产”到“资源”，不是一种理论研究，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正在进行着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还能很清楚地辨别其利弊的社会实践。

课题立项不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就开始启动并迅速展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步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我们的课题无疑是重大的促进。因此，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汇入这一保护工程，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话语空间，促使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知道，西部人文资源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很广的，以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及人力、物力想完全做好是很困难的。但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努力，每个人都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哪怕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一些思路、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也是值得的。

另外，课题结束了，我们课题的学术总指导费孝通先生却离开了我们，我们谨以我们勤奋的工作来纪念费先生，来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方李莉  
2008年夏

# 前　言

西部文化田野笔记可以说是我们课题的一部分成果，也可以说是课题的副产品。说是课题的一部分成果，因为它是课题规划中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说是课题的副产品，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成的。它们基本是学者们的一些考察笔记与随笔，在体例的要求上也没有严格的一致性，即并不要求是一种纯客观的记录。因为是笔记，在记录事件本身的同时，可以同时存在作者的个人经验、情绪、感觉、直觉、反映、思辨，甚至下意识等。在以往的学术规范中，这些都是在学术写作中需要剔除的、带有情绪化文学色彩的成分。就像马林诺夫斯基在土著部落考察后，贡献给学术界的只是那些经过了整理和理性分析以后的学术报告，但那些在考察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情绪的波动与震撼、各种事件经过的细节描写、作者与当地人之间的沟通与情感上的交流等，都只存在于他的日记中，在学术报告中这些丰富的各个断面都遭到了删除，因为这些都是非客观描述的方面。

其实，人文学科的研究很难存在纯粹的客观。许多论述宏大叙事的理论，一方面在追求绝对真理、绝对客观；另一方面，在研究和整理材料时往往把不能与他们讲述的理论相容的维度或细节都统统加以删除。任何一种理论的研究都隐含着某些观念对另一些观念的特权，支持某些视觉和排斥某些视觉。从这一角度来看，由于没有经过理性的分析和整理，笔记里的东西也许会比较杂乱，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读到学者最原始的感受、最纤细的情感描述。所以，田野笔记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副产品，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课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除了对西部人文资源中包含的以往的文献的整理外，对一些现状的具体专业性的考察。本课题的学者来自不同的专业，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和研究的目标，那就是西部的人文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的内容太多，学者们只能从各个不同的专业和地区去各个击破，因此在课题的最终成果中，每个学者的研究都被限定在严格的专业研究的范围内，所撰写的内容是不能超出专业范围的。但当我们具体下去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文化现象并不只包括在某一专业

的视野中，它的丰富性及与各个学科的密切联系性，是很难用纯专业的理论将其描绘或表述出来的。因此，在许多专业的学者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所观察到的文化事实早已超出专业的范围，而且也很难将其考察纳入到纯专业的范围中。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考察笔记、考察日志，不仅包括了对事实的记录，还包括了学者本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个体体验，都是非常珍贵的对西部文化田野现场的记述和理解，整理和出版出来将会是经得起任何时间考验的历史记录。

就像本系列考察笔记的作者王宁宇先生，他的专业是研究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的，他考察陕西药王崇祀最早是被“药王崇祀”中“花馍”的制作所吸引而去的，因为这是民间美术的部分。但在其考察中，整个的学术视野便被开拓到了一个整体的文化空间中。感动他的不仅是民间美术，还有那些产生在民间生活中巨大传统力量的延续精神。在那里，他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与“会”。他看到的是，陕北乡村没有关中地区普遍存在着的“社”，而这些星罗棋布的以乡村小庙为支点的“会”，乃是与关中的“社”作用大体相当的，是凝聚和建构民间力量及民间宗族制度的极为重要的方式。作为仪式中最重要的道具——“楼轿”，是神灵代步的肩舆（轿），更是神庙的符号象征，是不可移动的建筑与群众具体生活空间一种能动的媒体。围绕它的形制打造、装饰手法、保管接请以及出行、处理诸相关事项的原则、仪程、禁忌，蔓生出方方面面的习俗或制度。楼轿本身成为一种复杂的文化载体，映射出乡村历史与社会、审美与信仰、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和进程。作者被他的考察对象所吸引，采访了仪式中的不同角色和不同的组织者，写下了大量的考察笔记。在往返不断的考察中，他记录下了近十几年陕北药王崇祀的变迁过程，也包括了他对当地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在他的笔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丰富的、多角度的，而且充满着生机的陕北民间文化。

在潘年英的笔记中我们更看到了一个生动的、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对西南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描述。作者不像学者，倒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读他的笔记让我们想起美国学者乔治瑞泽尔所说的，对后现代主义者而言，社会理论家就是一些讲故事的人，这就有助于摘去罩在理论家头上的神秘光环，消除他们的活动与那些外行人的活动之间的区别。毕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讲故事的人。在潘年英笔下的“冲傩还愿”活动，苗族“茅人节”、牯脏节等不同民族的节日仪式，都与生殖或生命有关。在今天，这些民族的这些节日仍然存在，但原有的意义已经被冲淡，更多的是倾向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做点贡献。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醉翁之意已不在酒。经济的转型，文化的变迁，在作者充满着矛盾情感的笔下，不断向我们展现。包括挪威政府在贵州梭戛建的“生态博物馆”，“欧洲经验”和中国国情之间的矛盾，作者没有用学术的理性分析来向我们讲述他的观点，而是通过具体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文化保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

在方李莉的两本考察笔记中，第一本《西行风土记》，我们随着她的足迹深入到陕北的沟沟峁峁、山山梁梁。在课题中方李莉是牵头人，但从她的专业角度来看，她的本意是多做民间工艺或民间美术的考察。因为人们常说艺多不精，所以在考察中她也试图将视点聚焦在一个点上，但下去以后她发现，在学者的研究中，我们把所有的

专业都分得清清楚楚，但在民间文化中，所有的专业都是纠缠在一起几乎难以分离的文化团块。她下去后从来不住饭店，都是住在某一民间艺人或工匠窑洞里，甚至和秧歌队员们一起走村串乡，一起滚在农民的大炕上。在考察中她发现，这些民间的艺人和工匠们，他们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空间中。他们所从事的手艺及艺术，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周围的人和事，甚至与他们的生产方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观察这一切，我们就很难解释他们的艺术行为。尤其是民间的这些草根艺术，它们本身就是与艺人们的文化甚至历史连成一片的。如果我们将其单独地剥离出来，它们就成为了一种没有生命仅供解剖的标本。因此，她的笔记早已超出了事先所限定的范围。在她的笔记中，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脉搏在涌动的历史洪流中急剧的变化，也感受到了艺术在民间文化中的价值与意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当今西部民间文化在“资本逻辑”、“市场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各种“权力”和“权威”形成的力量正在重构一个新的民间文化的空间，民间艺术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本《梭戛日记》是作者和课题组成员们一起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做考察时写下的日记，在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考察中如何亲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剧烈的变迁与重构的过程，也看到了她在考察过程中所面对的种种复杂心理矛盾。她不断地考察不断地质询，通过她的讲述我们看到，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那么简单，并不是仅仅用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就能解决的，这不是一个工程，更不是一种技术化的问题，民众的生存需求与情感向往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要具体得多，也要生动得多。

在这些笔记中，由于每个人的专业不一样，所关注的视野和角度都有所不同，而且各自的文风也都不一样，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关注的是同一块土地上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课题所要研究的西部文化的田野。他们的考察笔记为课题总体报告书撰写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在总体报告书中我们将删去他们撰写的所有细节，而抽出其中对报告书有用的资料，以证明我们的假设与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描述中，很可能会遮蔽笔记中的许多非线性直觉，以及丰富的个人情感的表达。幸好我们出版了这套笔记，让人们看到了考查资料最原初的面貌。

丛书编委会

# 目 录

<b>第一部分 黄土地的记忆 .....</b>	<b>1</b>
<b>一、引子 .....</b>	<b>1</b>
<b>二、考察前的准备 .....</b>	<b>2</b>
(一) 资料的准备 /2	
(二) 决定考察路线 /3	
(三) 到达西安 /3	
<b>三、进入黄土高原 .....</b>	<b>4</b>
<b>四、洛川民俗博物馆 .....</b>	<b>7</b>
(一) 桑耕厅 /8	
(二) 民俗厅 /9	
(三) 婚俗厅 /11	
(四) 洛川人的传统教育 /13	
(五) 洛川的皮影戏 /14	
<b>四、洛川县凤栖镇谷咀村考察 .....</b>	<b>16</b>
(一) 屈延军一家 /16	
(二) 过时的农家器具 /18	
(三) 村中的平常人家 /20	
(四) 洛川面花 /22	
(五) 正在逝去的手工艺术 /24	
(六) 村中工匠的命运 /27	
(七) 民族杂居的遗迹 /29	
<b>六、安塞之行 .....</b>	<b>32</b>

(一) 安塞的土地 /32	
(二) 安塞文化馆 /35	
(三) 一场偶遇的婚礼 /36	
(四) 剪纸能手侯雪昭的家 /46	
(五) 安塞剪纸 /49	
(六) 安塞腰鼓与闹社火 /56	
(七) 安塞的葬礼习俗 /58	
七、郭塔村考察 .....	63
(一) 农民艺术家薛玉琴的家 /63	
(二) 陕北窑洞的魅力 /67	
(三) 山里的年青媳妇 /71	
(四) 薛玉琴们的剪纸和绘画 /73	
(五) 郭塔村的农民 /78	
八、陕南之行 .....	82
(一) 汉中地区的戏剧 /82	
(二) 罐罐窑村的考察 /86	
九、尾声 .....	91
<b>第二部分 小程村民间艺术考察记 .....</b>	<b>93</b>
一、引子 .....	93
二、小程村的大年三十夜 .....	94
三、小程村的历史遗迹 .....	97
四、村里爱美的婆姨们 .....	101
五、山歌里的村民世界 .....	103
六、结束语 .....	105
<b>第三部分 陈炉镇民间陶瓷考察 .....</b>	<b>108</b>
一、炉山不夜 .....	108
二、陈炉窑户 .....	110
三、陈炉的窑火不再红火 .....	113
四、陈炉镇的历史追述 .....	115
五、终结与未来 .....	119
<b>后 记 .....</b>	<b>121</b>

# 第一部分 黄土地的记忆

## 一、引子

古人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不仅要读很多书，还要行很多路，知识不仅写在书本上，也写在大地上。一个曾有众多人类群体活动过的地域空间的存在，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无言的历史文化遗迹和生活习俗的碎片，一代一代的人类群体消失了，但他们的物质创造，他们的精神创造，却不会完全消失。这些不会消失的人类遗产组成了一个我们现有的人文世界，同时也形成了深厚的具有极高研究和发展价值的人文资源。对于后代来讲，它是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课题组要对西北地区的人文资源状况进行一系列实地考察。这是研究任务，也是学习和读解那些遗存在西北大地上的文化资源的机会。考察的内容包括西北的人文历史、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民间艺术、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当地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变迁过程等。我们课题组有许多来自不同单位和不同专业的学者，但这次真正有时间下去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研究戏曲的专家刘文峰先生，他承担了民间戏曲方面的研究，一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张红萍女士，同时她还兼我们课题组的秘书。我是课题组的组长，除掌握课题的全盘构架，还承担了民间手工艺方面的研究。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临时考察队。这次的考察是以民间的手工艺和民间的戏曲作为主线，兼顾其他。

由于考察的内容较多，所以，我们确定这次考察的范围主要限定在陕西省境内的某些地域。

## 二、考察前的准备

### (一) 资料的准备

黄土高原、秦岭、巴山，曾是我梦中神游过的地方，现在要真正去那里做考察，心里很是激动。

每到一个地方做田野考察，我都要事先做一些案头上的准备，比如找一张详细的地图确定要考察地域的位置，还要事先了解它大致的地形地貌和人文历史状况。

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已将陕西省的大概情况熟记在心。陕西省位于中国中部黄河中游地区，南部兼跨长江支流汉江流域和嘉陵江上游的秦巴山地区。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相邻，南以米仓山、大巴山主脊与四川省接界，东南与湖北省、河南省接壤。总面积为205600平方公里。

其地形南北狭长，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横卧其中南部的秦岭山脉是两大流域的分水岭，秦岭以南部分属长江水系，其主要支流有汉江、嘉陵江和丹江的上游；秦岭以北部分属黄河水系，其主要支流有渭河、泾河、洛河、延河、无定河等。由于这些河流皆流经黄土高原，故富含泥沙，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在陕西省狭长的地域中间有秦岭阻隔，南北颇异其趣。其间山原起伏，河流曲折，各有特色。秦岭以北属于黄土高原。在秦岭与黄土高原的相交地，有一块方圆八百里的平原，被人们称为八百里秦川。这一带属于关中地区，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的发达地，是省会西安的所在地，也是古代长安的所在地，曾有十一朝皇帝在此建都，从西周开始一直到唐代，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而且远在一百多万年前，那里就活动着原始的蓝田人，在二十多万年前，还活动过原始的大荔人，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也都在那里留下了许多人类活动的痕迹，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那里还是黄帝、炎帝的故土，上古时期的中国神话，一直都与那片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陕西省按地形可分成三大部分，一部分是享有八百里秦川之誉的关中地区，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由于其地势平坦，黄土层厚，土地较肥沃，易耕种，而且交通方便，是陕西的中心地区，也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关中地区自西周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前台，其基础在于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及所造就的物质文化条件。在西周至战国，这里属于秦国，到战国末年，秦国的粮仓里都积满了粮食，到处可见“万石一积”的仓库，栎阳仓为“二万石一积”，首都咸阳竟达到了“十万石一积”，农业的发达，粮食的丰收，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所以，这里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区，产小麦、豆类、棉花，历史上男耕女织，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影响很深，尤其是受周礼的影响。据长期在陕西做民俗考察的学者赵宇共先生介绍，在关中、陕北一带的丧葬和婚俗中至今都还有周礼的遗存。

陕南和关中之间以秦岭相隔，自古有“天下之大阻”之称的秦岭，使陕南和关中之间的往来极不方便，虽然在古代陕南有六条栈道可通关中，但山路崎岖，行走艰险。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陕南和关中及陕北之间极不相同的地理风貌和文化传统。

陕南是介于秦岭和巴山之间的盆地，离四川和湖南、湖北很近，产稻米，属于稻作文化区。远在战国时，这一带的富饶就闻名天下，汉初关中大饥，政府令百姓就食蜀、汉。逐渐，汉中、川北之地粮食生产比较稳定，所以陕南素有“粮仓”之称，在当时常为都城长安提供粮食。由于有秦岭之阻，这一带受关中、陕北影响较小，受楚、蜀、两广、两湖文化影响反而较大，民间盛行巫术，巴楚风味很浓，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

陕北靠近内蒙古、宁夏一带，在古代属于边塞地区，地广人稀，曾有多少少数民族在此过着放牧和游猎的生活。汉初实行“移民实边”的国策，大量移民来到这里居住，在这里开田植谷，扩大耕作面积。经过长期的努力，当地的农业得到了发展，自然景观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片草原与森林逐渐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村庄和农田”。尽管如此，这里的游牧业并未完全消失，始终属于半农耕半游牧地区，产小米、麦子、玉米，放牧牛、马、羊，古代的羌人、胡人、匈奴人、鲜卑人都曾在这里杂居，现在都基本汉化，形成了民族大融合。

## （二）决定考察路线

通过资料的查阅，对陕西省的地理和文化分布状况有了一个较明晰的了解。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决定具体考察的地区和路线。

当时的考虑是，关中地区虽然是陕西省历史上的文化中心，民间艺术种类多，传承的历史也很悠久，但由于这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许多传统已经消失，而且这里离北京相对较近，以后再来也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决定先利用有限的时间考察陕北和陕南。

第一步，先考察陕北。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能选点考察，我们选择了黄陵、洛川、安塞三个点。这三个点刚好在一条公路上，不用绕路。而且都富有代表性，黄陵曾是黄帝生活和埋葬之处，这一带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的中心；洛川是黄土高原与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交界地，具有陕北地区和关中地区交融的文化风格，同时听说，那里还有一座全陕北办得最好的民俗博物馆；安塞是全国有名的文化县城，那里的剪纸、腰鼓、民歌早已闻名全国乃至海外，是一个值得考察的地方。确定了考察地点，我们检查了一下我们的行装，一台手提电脑，一台佳能照相机，一台松下摄像机兼数码照相机，再一人一部手机，以便在路上万一走散时好互相联系。一路上的分工是，我负责摄影，刘文峰负责拍录像，张红萍负责文字记录与后勤。

## （三）到达西安

我们于2002年3月20日离开北京，21日到达西安，在西安呆了3天，主要的任务还是做考察前的调查与案头准备工作。在这期间，我们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陕



从飞机上看黄土高原

西省艺术馆，加深了对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理解与印象。还和本地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通过和他们的探讨更加明确了我们考察的内容与目的。同时，收集了许多当地的文献资料，以便在路上阅读。

### 三、进入黄土高原

3月23日我们离开西安，开始了我们的陕北之行。按计划，我们将到安塞做一个较细致的田野考察，途经黄陵县和洛川县，因此第一站我们将去黄陵县。早上8点钟，我们到了西安长途汽车站，车站里停满了开往陕西各县市的豪华空调车。一到车站，我们就被许多拉客的司机和售票员围住，最后，我们上了一辆到店子头途经铜川和黄陵的汽车。

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看得出有不少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在车子的最前面挂着一台不太大的彩色电视机，里面正在放映一部外国侦探片，我没有看到片名，但看了几分钟后觉得很精彩，便也被吸引了。心想，到黄陵要三个多小时，一路上如果都能看这么精彩的电影，时间也就不难熬了。真是感谢现代化，让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消遣和不寂寞。看着车上的乘客，他们也看得有滋有味，电视里临海而建的豪华别墅和方便

现代的西方生活，使一些农民的眼里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羡慕的眼光。电视使他们不用离开家乡，不用离开陕西，就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生活，传媒的力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我要去的陕北是陕西省较落后、也是一个较有自己文化传统和特色的区域，不知道现代化的力量是否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改变着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一路上，汽车盘旋而上，我们正在进入黄土高原。从窗户望去，我们正行驶在一道峡谷之中，两边开满了粉红色的野桃花，还有一些开垦在山腰上的土地里开出了一片片灿黄色的油菜花，这些信息在告诉我们，春天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春天来到西北的农村。

不久我们开出了山谷，上到了山顶的开阔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另一番风景。这里是真正的黄土高原，遍野高低不同的黄土坡地，被深深的沟壑分裂成一块块大小不同的塬。称其为塬，是因为它们虽然顶、底高差很大，但顶部却是一片一片的平地，而且是黄黄的，干干的，上面只有极少的一点植被，让人感到一种壮观和苍凉。虽然陕西黄土高原的这种地貌我曾在电视和其他图片中看过，但身临其境，感受还是不一样。它使我联想到了我在欧洲的旅行，高速公路两旁厚厚的绿色草地，还有草地上一片一片的绿色树木，人们几乎看不到黄色的尘土，空气很透明，天也是碧蓝碧蓝的。

其实我在来陕西之前，曾阅读了不少有关陕西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知道这里在几千年以前，曾经有茂密的森林，众多的河流与湖泊，几千年来，由于过度的垦荒和开发，导致了大量的水土流失，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一片荒凉景象。看着窗外，我们正在经过一条河流。河床很宽，但中间的水流却很细，就那么少的水量，也都是黄黄的、混浊的，里面带足了稠稠的泥沙。

刚进入黄土高原，就让人感到了这一带生态之脆弱、水源之缺少的困境。当然，我们这次去考察的不是陕北的生态环境，而是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中的绿洲。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环境下能生存下来的人们，不仅是在生存的技能上有着众多的经验和智慧，就是在支撑其生存的精神上，也一定有着无比丰厚的情感上的、艺术上的表达方式。

在路上行走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黄陵县。已经是中午，我们想先找一个地方吃点饭休息一下，正好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不大的饭馆，好像很干净。这是一家农户自己开的餐厅，只有里外两间房，后面是一个厨房，一看就知道是住家改的。开店的是俩夫妇，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妻子招待客人，丈夫掌勺，女儿送菜，一家人分工明确。我们高兴地坐下来，希望能吃到一顿地道的陕北农家饭。我们要了一盘“洋芋擦擦”，这是一种用马铃薯和着面粉蒸的食物，既可以当饭也可以当菜。还要了一盘“黄糜子油炸糕”，黄糜子有点像小米，是当地生产的一种粮食。蒸熟后，切成块，炸一下，糍糍的、软软的，上面撒一层白糖，吃起来有点像糯米，味道很好。还有一盘“大烩菜”，这是当地人最喜欢吃的一种既方便又好吃的家常菜，是将豆腐、白菜、粉条、萝卜、土豆，再加上几片切得很薄的五花肉，一锅煮，热腾腾的一大碗。这几样都是我从来没吃过的地道的陕北食物。我们看着这家人很干净，也很纯朴，所以吃得很开心。吃完后算账，一盘“洋芋擦擦”竟要12元，比我们家乡的肉